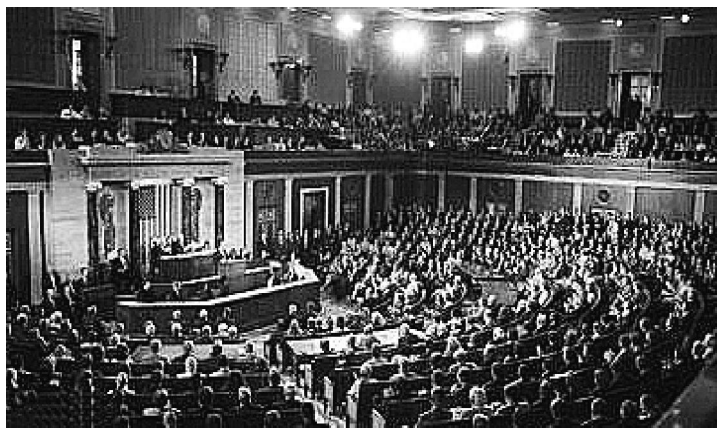
责编：泓佐 E-mail:ccps6235@163.com Tel:010—62806235

◆战略视角

美国担忧什么

□韦艾德 钱镇/译



政治：政党极化

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人——包括精英和公众、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开始担心美国政治。美国人还记得，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政治都是以两党合作的方式运作的，这使得美国人（错误地）以为美国政治总会是这样。但是相对于理想化的过去，今天美国政治出现了分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政策制定过程陷入僵局，不能产生需要的政策。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普通的美国民众比过去极端，而是美国的政党现在高度极化。

共和党越来越极端地代表所谓的“保守主义”。在选民支持上，他们日益狭窄，越来越极端的只是保守住自己的政治基地，特别是在东西海岸之间的地带、南部和农村。民主党代表所谓的进步主义，他们极端依赖城市人口，特别是在东西沿海、少数民族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和青年。

除了总统竞选期间，双方都缺乏吸引或安抚对方选民的动力。所以在制定政策时，政客们更多地是展示其保守主义或进步主义的纯洁性（为了吸引他们的“基地”），而不是相互妥协、制订可行的立法。巧的是，双方都得到大约一半美国人的支持，这就使得每一方都有动机和能力阻止对方想做什么，至少通过立法实现这种阻止。因此，在第二个任期内，奥巴马将更多地转向和依赖行政部门做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进一步立法。所谓可以做的事，可能是进一步规范煤炭燃烧排放以减少对健康危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由于政治僵局使得当前的美国政治形成了大多数决策都有短期的特点。这就造成了只有当他们真的没有选择时，才能达成双方都同意的意见。像政府耗尽资金不得不关闭，这种迫在眉睫的危机。即使这样，一方或其他可能坚持关闭政府一段时间而不是妥协他们所谓的思想原则。

经济：预算协议

最近，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2013年10月初，共和党因增加国会允许行政部门借用资金数量的问题使政府短暂停摆。这一事件伤害了美国经济，让美国公众惊恐，并以大幅减少对共和党人的支持作回应。

2013年12月，国会面临着另一个财政问题，即2013年10月到2013年9月批准多少政府支出。这时，一些共和党人害怕进一步对抗公众，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通过一项“妥协”的预算法案。正如双方都希望的，该法案对2013年1月开始的过于严重的削减支出进行了放松。该法案也在共和党希望削减社会支出和民主党希望增加社会支出的立场间达成妥协。法案不仅覆盖2013—2014年度，也包括2014—2015年度，使政治家在2014年这个选举年得以避免再一次撞上预算上的麻烦。

2013年12月的预算法案——两党预算法案——避免了2014年1月的另一个“财政危机”。法案是以与过去5年协商财政问题相比明显温和的方式进行的。评论人士开始揣摩美国政治可能会恢复“正常”，国会能真正履行拨款管理的作用。起码，通过这个预算法案比没有好。但就国会履责上讲，这只是个相当小的成就。实际上，该法案并没有就任何一方真正想要的任何事情作妥协，法案的目标简单地避免了这些议题。此外，债务上限需要在2014年3月再次提高。一些共和党人已经要求民主党同意削减社会项目的开支，以换取他们的同意。所以到时候，可能会有另一场大的战斗。

2013年12月通过的预算方案——两党预算法案，仅适用于国家预算的全权预算支出“discretionary”部分——国会可以逐年改变。全权预算支出的两个主要部分是国防和非国防。

两党预算法案下的国防和非国防的支出将高于全面强制分段减支下的支出。但低于奥巴马总统建议的。国防方面，两党预算法案支出将既低于民主党人提出的也低于共和党提出的。非国防方面，两党预算法案支出将低于民主党提出的，但远高于共和党提出的。

身份：移民改革

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政策，根本问题是美国人的身份。“美国精神”（Americanism）是什么，谁能代表它？

在实践中，共和党主要代表本土者的观点，民主党代表普遍性的甚至国际化的观点。大多数支持共和党的国会选区，通常是白人中产阶级（通常是老年人）较多，少数民族特别是新移民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如何改革移民的身份问题。至少在短期内，这些共和党政客在政治上是限制新的合法移民的数量，加强边界，防止非法移民而受益的。

共和党人遇到的问题是，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国际化人”（cosmopolitans）的数量逐渐增加：包括新移民和支持更多移民的人。共和党人可能继续保有更保守的国会选区，但2012年的情形表明，共和党候选人越来越难以赢得全国总统选举。

即使在2012年总统候选人被击败的情况下，一些共和党政客仍然拒绝加强边界控制以外的移民方面的改革。一些共和党政客们——尤其是希望在2016年竞选总统的极端保守派支持移民改革的想法，但只是有限的改革。然而，许多中间派共和党领导人誓言加强对改革的支持，包括让已“非法”来美的1100万移民合法留在美国。民主党人也想这样做。2012年，奥巴马连任后短时间内人们一度感觉，2013年会有一些移民改革。

保守派和进步派更容易接受通过加强边境控制排除非法移民，而不是通过更新移民政策接纳合法移民（如进步派的希望）。相对温和的参议院成功地通过“全面”意义上的移民改革，既包括排斥也包括接纳。更极端的众议院甚至不愿意尝试“全面”改革，而是偏爱处理特定议题的法案，表现在共和党众议院领导人可能允许通过的法案将加强排斥、不增加接纳。

与此同时，2013年年底，发生在康涅狄格州的学校枪击事件，使“枪支管制”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把人们对移民改革分歧的注意力转移了。2013年年底，移民改革立法的前景似乎很渺茫，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出现在2014年国会选举前，可能要到2016年总统大选后。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奥巴马能在没有进一步立法的情况下，通过行政措施做多少事？答案是不多。国会规定，1100万已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要被驱逐出境，美国移民系统只能以每年约40万人的速度运行。因为是国会规定，所以总统必须继续驱逐。但是他却可以决定，1100万人哪些先驱逐，哪些后驱逐。他已经这样做了，他推迟了一些年轻人的驱逐出境：那些被父母带到美国、完成了教育、又没有犯罪记录的。他不能做得更多。

安全：枪支改革

与移民问题一样，2013年年底，枪支改革前景渺茫。

拟议中的放松小型枪支监管的变化，因为学校枪击事件没能发生。2012年，奥巴马政府已经计划简化美国枪支制造商出口产品的程序，但是学校枪击事件使这样的简化出现争议。因此，放松出口被推迟，到2013年年底，仍然没有变化。结果，美国体育用枪出口到其他国家仍受限制。

◉链接

韦爱德（Edwin Winckler）

韦爱德，美国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校教授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政治、比较政治社会学等，并依托上述学科理论研究中国问题，达50年之久，著有《台湾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的人口政策》等学术著作，并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包括“奥巴马的改革政治”，刊于《南开学报》2011年第1期。

2013年韦爱德教授被东北师范大学聘为“东师学者”讲座教授，为期3年，在该校讲授美国政治，他曾两次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作有关美国政治的演讲。2013年起，他在财新网开个人博客，从学者的角度向中国广大民众介绍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

◆热点透析

全球创新指数的背后

□郭 莲

美国学者波特等人在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对美国竞争力的挑战已经发生了明确的转移。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整顿金融机构秩序，开发全球市场，改善产品质量、削减成本以及缩短面市时间而提高产业生产率。在应付了这些挑战之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国家创新能力。”

显而易见，创新能力已成为提升生产力、增强国家竞争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和源泉，创新能力的强弱也成为能否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和持续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因此，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如何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就成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标准主要是通过创新指数报告完成的，而“创新指数”是指创新能力评价中得到的分数，它是创新能力的一种定量表达。当今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度最高的创新指数报告是“全球创新指数”，因为这一报告中所使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各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统计或出版物，具有国际可比性。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将创新描述为“导致产生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发明和创造的融合”。这一报告旨在评估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针对创新挑战作出的反应，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能存在的缺失与改进方向提出建议，为政府决策和提升国家或地区竞争力提供参考。

全球创新指数是在2007年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首次开始研究的，随后每年发表一期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3年7月份该学院联合康奈尔大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发布了201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该报告考查了全世界142个经济体的创新状况。

全球创新指数创立了一个综合性并可量化的指标体系，这一体系可用来全面评估全球创新活动和各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一指数报告所评估的项目不仅包括GDP中研发投入比重、专利和商标数量等重要传统指标，还逐年涵盖了如基础设施、商业环境、人力资源等多元化指标，这不但扩展了研究范围还深化了研究内容，为研究世界各国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另外，这一指数报告不但采用了客观定量的硬指标和综合性指标，同时还采用了主观定性的软指标等多种研究手段，加强了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全球创新指数由5个“创新投入指数”和2个“创新产出指数”，共计7大类指标构成，它们分别是：制度（政治环境、管理环境和商业环境）、人力资本和研究（教育和研发）、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能源和一般性基础设备）、市场成熟度（信贷、投资和贸易竞争）、企业成熟度（知识型工人、创新链和知识吸收）、知识和技术输出（知识创新、知识影响和知识扩散）、创新输出（无形资产创造力、创新产品和服务以及在线创新）。其中包括7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和84个三级指标。这些指标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综合反映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创新方面的优劣势、能力和绩效。全球创新指数由创新投入指数和创新产出指数的平均值计算而成，而二者的比值为“创新效率指数”。

全球创新指数模型每年都会有所调整，比如，从2012年开始，在数据源赋值方面调整的有商业成熟度、知识和技术产出（包括专利、科学出版物、技术转让使用、高技术出口等）两个方面。另外还新增加了1个“在线创新”二级指标，其中包括每千人通用顶级域名拥有量、国家代码顶级域名拥有量和每月维基百科编辑次数等3个三级指标。

中国在201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排名第35位，比2012年下降一位，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第三，在东南亚及大洋洲16个经济体中排名第8位。同时，中国在“创新投入指数”中排在第46位，在“创新产出指数”中排在第25位，因此其“创新效率指数”位居第14位，总体创新效率比较健康。

中国在所有创新指标中表现比较强劲（排名前10位之内）的13个指标依次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阅读、数学和科学成绩（第1位）；三所领先大学的顶尖大学排名（QS）平均得分（第9位）；资产形成总额在GDP的比重（第1位）；股票交易总额占GDP的比重（第7位）；提供正式培训的公司总数占比（第1位）；企业提供的研发资金（第4位）；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平均成绩（第7位）；高科技产品进口比重（第5位）；本国居民国内专利申请量（第1位）；本国居民国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第1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第3位）；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第3位）；创新产品出口（第1位）。

中国表现相对较弱的指标是：“在线创新”指标（第136位），其中包括上传到YouTube的视频率（第142位）和每月维基百科编辑次数（第123名）；还有创业便利程度（第118位），教育公共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环境绩效（第111名），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第128名），货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第105名）。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通过将创新指数总得分与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划分出三类处于不同创新群体的国家或地区：创新领导者、创新学习者和创新欠佳者。这样的比较反映出世界各国在创新能力上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存在的创新差距最为突出，高收入国家在所有创新表现指标方面均远超出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其二，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创新差距，高收入国家与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相比较尤为如此。

从整体上看，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生活水平等方面，也体现在能够说明一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科技创新能力上。由此可得出结论，创新指数排名的高低与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因为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的作用。

那么一个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与这个国家的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系？换句话说，生活在某个特定国家里的人们所具有的创新能力是否会受到该国文化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文化是否会导致其创新能力的提高或降低？

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没有相关方面的研究，国外则有少数学者对此做了一些研究。比如，美国学者Scott Shane等人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把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最能代表创新能力的“专利数量”和“商标数量”与跨文化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工具——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进行对比，发现创新能力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如个人主义价值观和避免模糊性维度与创新能力呈正相关的关系，而权力差距维度与创新能力则呈负相关的关系。

◆西方社会

瑞士的“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

□王彬彬

瑞士凭借富足的经济条件和健全的政策支撑，建立了兼具全民性、强制性、均衡性和效益性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瑞士在1947年的全民公决中，以80%的赞成票通过了基本养老保险草案，并于次年元月实施，标志着现代养老保险制度在瑞士正式确立。此后，虽历经十余次修订，这一制度始终奉行“通过互助共济去缩小代际、贫富、性别、家庭、地区和城乡等差异导致的不平等以增强社会团结”的理念，遵循着现收现付的筹资机制，并以其健全、完善和覆盖面广的特点，成为维护和谐稳定的坚实后盾。

瑞士的养老保险制度，依据世界银行所提出的“三支柱”理论设计，建立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三大支柱之上。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这是一种用于保障老人和遗属、伤残人士最低生活水平的强制性保险，对象包括所有在瑞士工作的人，含外籍劳工以及不在瑞士居住但在瑞士工作的从业人员；所有在瑞士居住的人，含儿童以及非从业人员，如学生、家庭主妇、伤残人员和退休人员。根据法律规定，无职业者年满20岁后开始支付养老、遗属和伤残保险金，支付期限截至官方规定的退休年龄；从业人员则从17岁后开始支付。在职人员的养老、遗属和伤疾保险是由雇主和雇员各支付50%。第二支柱：企业职工保险。这被用于保障瑞士国民一般的生活水平，旨在使其与第一支柱之和，可替代国民退休前最后工资的60%，足以使退休老人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根据瑞士企业养老、遗属、伤残保险法，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因年龄和性别的不同，分别占其工资的7%（25—34岁）、10%（35—44岁）、15%（45—54岁）和18%（男55—65岁，女55—64岁）。目前，投保年收入的上下限，分别约为77400和19350瑞士法郎。企业职业保险由各个不同的保险基金组织管理执行，各公司和雇主必须参加其中的一个企业保险基金组织。第三支柱：多样化的个人养老保险。作为对前两大“支柱”的补充，凡在瑞士居住的人都可自愿参加个人养老保险，以个人储蓄作为第三笔养老金。随着瑞士人口老龄化的加重，个人养老保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瑞士政府还通过减免税的方式鼓励个人参保。在上述“三支柱”的有力支撑、相互补充下，瑞士退休人员除了通过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保险，领到相当于退休前工资60%的养老金（一般为每月2000至6000瑞士法郎）之外，再加上个人养老保险，完全能够保证他们过上优越的退休生活。

瑞士这一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以政府保险为主、商业保险为辅的全民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具有以下四个显著特征。一是覆盖面广，保障全面。“三支柱”构成了瑞士养老保险制度的完整体系，它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无论性别、社会地位、民族和收入高低，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养老保障。二是互为支撑，公平导向。“三支柱”相互补充，共同支撑起瑞士的养老保障机制，它们都有固定的目标，即保障基本生存、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方式和保障较高的经济需求。从“三支柱”投保金额角度看，投保人根据自己的收入投保，不设上限，收入越多，按比率投保的数额就越大；但在给付数额上，法律规定最高给付额不能超过最低给付额的两倍。也就是说，投保额高者，获得的给付额未必就高；相反，低收入人群会因此得到较多的给付。从1966年起，瑞士还对鳏寡孤独者给予养老保险金特别补贴，他们每月至少可领取到1205瑞士法郎的基本养老金。这些显示出瑞士养老保险制度的均衡性与全民性特色。三是法制完备，保障完善。瑞士关于养老保险的法制，除了联邦层面的宪法条款、专业法规和其他制度，各州还结合实际出台了有针对性的补充机制和特色法规。同时，瑞士还设立了统分结合、权责分明的专业政府机构，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从政策支撑、福利保障等方面保障确保了老年人的权益。四是以人为本，养老渠道多样。在政府资助下，瑞士形成了三种比较成熟的养老照料方式：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在瑞士，老年人可自由地选择养老方式和养老机构，大约25%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养老机构主要包括养老院、护理院和临终关怀机构等。以养老院为例，瑞士政府无偿资助养老院并对其进行严格管理，要求养老院为老人提供专业化护理和人性化服务。入住养老院的老人，视身体状况分为8个等级，平均每位老人有1个护理，每个等级的护理都有相应的工作要求。

长期以来，这种制度设计让瑞士实现了全民普惠养老保障的目标，也令其在国际上获得了较高声誉。由于瑞士人保险意识极强，而且其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瑞士已取代日本成为人均养老保险费支出最高的国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但另一方面，作为欧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瑞士也面临着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巨大挑战。为此，瑞士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同时进行着试验和探索。新世纪以来，瑞士对“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体系进行了密集的修改完善，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三次改革。一是2006年的改革。瑞士一方面将男女居民的退休年龄统一到65岁，另一方面降低了除无子女的独居者外，所有62—65岁退休的低收入者的养老金。二是2007年的改革。瑞士政府提高了在职员工养老金最低缴费比例，将缴费比例由2.5%上调至2.75%。三是2012年的改革。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瑞士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进程。瑞士工会联合会牵头提交了详细的改革计划，内容包括提高低收入者和平均收入者的养老金比例。譬如，月收入不足5000瑞士法郎者，退休后将领取工资80%的养老金，而不是前文提到的60%的替代率。尽管采取了以上诸多措施，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和深化，瑞士原有的建立在较为稳定的人口结构之上的“三支柱”式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仍将面临巨大挑战。根据预测，瑞士的老年抚养比率（65岁以上和工作年龄人群的比例）到2050年会增长到49%。也就是说，到2050年时，每两个工作年龄的人就要抚养一个退休者。可以说，瑞士进一步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可避免，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技术和政治上都是复杂的难题，将持续考验该国执政者的勇气和智慧。